

“海滨邹鲁”泉州的书院有多“卷”



“泉州书院”系列

泉州,这座以商贸闻名于世的千年古城,骨子里却藏着一份重教兴文的温柔与坚定。

朱熹开创“书院模式”之后,一批批名人在此成长,科举屡屡折桂,终成“海滨邹鲁”。成绩背后,是泉州唐末至清末记载的73座书院的教育探索和赓续传承。欧阳书院、温陵书院、小山书院、石井书院四大书院被后人比作“古代泉州版清华北大”。那么,这些“古代名校”究竟有多“卷”,才让“海滨邹鲁”的赞誉穿越千年,依旧掷地有声。

□融媒体记者 魏婧琳 庄建平 通讯员 林海吟



泉州山门前有王十朋所撰《重修北楼记》碑(本报资料图片)



“海滨邹鲁”碑(来源:福建日报泉州站)

在不同时代年轮里,泉州书院各放异彩。从唐末的星火初燃,到宋元的燎原鼎盛,再到明清的薪火相传,书院走过了千年风雨。

唐朝末年,几间茅屋、几卷经书,便构成了最初的学堂。彼时条件简陋,却已在泉州人心中埋下了向学的种子。唐贞元八年(792),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登“龙虎榜”,成为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。

如果说唐末的书院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宋元的泉州书院便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数量激增、规模扩大,成为全国书院发展的标杆地之

一:数量上,从最初的寥寥无几,迅速增长至数十所,乃至上百所;规模上,许多书院都拥有了宽敞的讲堂、丰富的藏书楼以及舒适的住宿区;影响力上,名家云集、学风鼎盛,成为当时教育讲学、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重心。

宋代开始,官方倡学、民间兴学、世家办学,让书院如雨春笋般遍布泉郡各地。朱熹等理学大家亲临讲学,四方学子慕名而来,书院不再是单纯的教书场所,更成为学术交流、思想碰撞、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。

那时的师生们有多“卷”?南宋绍兴年间,朱熹曾多次到泉州讲学,据载他“每至郡,必诣学宫,为诸生讲论,至夜分乃罢”。这种讲学至深夜的投入,让许多学子深受感动。

朱熹的学生陈淳在《北溪学义》中记录自己在泉州求学时的场景:先生讲学不拘泥于章句,常引

导学生相互辩难,有时一个问题要反复讨论数日,直到理明为止。这种自由又严谨的学风,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负笈而来。

正是这一时期,泉州科举人才济济,芳名熠熠,“海滨邹鲁”的文化名片,在书院鼎盛的滋养下,不断镌刻在泉州的城市基因里。

元代,泉州书院的文脉仍传承不息。据《泉州府志》记载,元代至元年间,泉州路总管府曾重修学宫,并鼓励民间办学,书院依旧承宋代余绪,坚守讲学之风。

明清时期,泉州书院在历史洪流中继续前行,虽面临诸多挑战,依然保持着发展态势。据史料记载,明代泉州有书院二十余所,清代增至四十余所。这一时期的书院,依然为泉州的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,不仅培养出一批批有识之士,也成为传播儒家经典、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场所。

“四大书院”立下标杆

在宋、元、明时期,欧阳书院、温陵书院、小山书院、石井书院并称泉州“四大书院”。对泉州人而言,这些书院之于这座城市,近乎“文脉所系”。

在泉州古代书院灿若繁星的夜空,四大书院便是最耀眼的几颗。它们以独特的讲学模式、开放的学术风气、深厚的育人底蕴,塑造了各展所长的“品牌IP”,成为标杆。

欧阳书院旧址在泉州清源山赐恩岩附近,因建于城外,得“刺桐城外读书台”之雅称。书院的源头可追溯至唐代——欧阳詹少年时曾在山中的欧阳洞潜心苦读。据载,欧阳詹“少有大志,刚毅过人”,在洞中与林藻、林蕴兄弟伴读,最终登科及第。明嘉靖、万历年间,欧阳詹的后裔为纪念先祖,在赐恩岩附近正式兴建了欧阳书院。山间清幽,学子在此既要与经典对话,也要与孤寂为伴,这种“山野论道”的治学意境,让读书成了一种近乎修行的心性磨炼。

温陵书院与小山书院或为朱熹所创建,或与他渊源颇深,两所书院同在泉州城内,却各有侧重。温陵书院原名泉山书院,始建于南宋,位于行春门外(今东街一带),是朱熹在泉州讲学的重要场所。南宋咸淳三年(1267),郡守赵宗正将城东天宁寺改建为泉山书院,后更名温陵书院。宋乾道年间,太守王十朋曾会集诸生于学宫讲经;嘉定年间,太守真德秀也在吏治之余,到书院“择才俊,讲道论文,奖掖后进”。两任太守亲自到书院授课,可见当时学风之盛。

小山书院即“小山丛竹”,位于泉州城北横巷范一带。南宋绍兴年间,朱熹常到泉州讲学,当地“老幼义理详悉”,学风浓厚。他题写的“小山丛竹”四字,后来镌刻于石坊之上,至今犹存。小山书院内建有“敬字亭”,是泉州敬重文化的一种象征——古代民间认为写有文字的纸片不能随意丢弃,要拿到敬字亭焚烧。这处小亭的存在,折射出当时社会对文字的敬畏之心。

的敬畏之心。

石井书院坐落于安海古镇,是泉州历史最悠久、规制最完整、影响最深远的书院之一。它的渊源可追溯至南宋绍兴初年:朱熹之父朱松任安海镇官时,“乃择民之秀者,充弟子员,教以义理之学”,邑人感其教化之诚,捐建馆舍供其讲学,初名“鳌头精舍”。二十余年后,朱熹在同安任职,往来安海数访父亲遗迹,士人因此更加勤学。嘉定年间,镇官报请泉州郡守建造书院,并派朱熹第三子朱在主持建院工作。嘉定五年(1212),书院落成,定名“石井书院”。书院的规制在当时堪称完备:按州县学宫之制修建,规模宏大。时人留元刚感叹:“天下如石井者凡几!”这样宏大的规模,在当时泉州各县属书院中实属罕见。石井书院的办学持续了数百年,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历代名儒出任山长,培养出众多人才。

四大书院或藏于山林,或立于城郭,或重理学正统,或尚开放包容,撑起了泉州书院的鼎盛格局。它们以自由讲学、学术论辩为核心特色,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刻板与僵化,让书院成为思想的沃土、人才的摇篮、文脉的载体,也让泉州的教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滨海兴学之路。

“海滨邹鲁”铸就辉煌

有人说,教育是一座城市最好的“软实力”。分布在泉州的书院就是这份软实力的生动诠释。

翻阅历史文献,对泉州文化教育的赞誉之笔屡见不鲜。如在泉州修建学宫时,有人写道:“温陵名邦也,理学文章,籍工于世。”

在科举考试的舞台上,

泉州士子频频闪耀。据统计,自唐贞元八年(792)至清光绪三十年(1904)的1100多年间,泉州共有文武进士2454名。《福建省志》统计,宋代福建进士共7144人,其中泉州府就占1418人,占比近五分之一,数量上长期居全省各府州前列。南宋时期尤其突出,如绍兴三十年(1160)一科,泉州进士多达三十余人,在东南各州中名列前茅。

更令人称奇的,是泉州科举中频繁出现的家族现象。史料记载,泉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十三家“父子进士”、二十二家“祖孙进士”,以及若干“兄弟进士”“叔侄进士”乃至“四世进士”。如晋江曾氏一族,在两宋时期走出四位宰相、一位状元,被誉为“一门四相曾半朝”。又如清光绪三十年(1904),泉州城北门执节铺人林猷鹤、林骝兄弟相携赴考,同榜登科,乡梓传为美谈。这种“父子连登”“兄弟同榜”的盛况,折射出泉州士族世代相传的向学之风。

泉州书院培养的科举人才,为家乡赢得了荣耀,为国家治理培养了栋梁之材,也成为泉

州文教繁荣的重要象征。

据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《话说泉州》记载,泉州过去在孔庙前曾建有一座“海滨邹鲁亭”,亭中挂一块“海滨邹鲁”匾额,典雅庄严,惜乎今已不存。亭中立有石碑,碑文为“接伊洛之渊源,开海滨之邹鲁”。这样的评价并非偶然,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泉州讲学期间,曾在开元寺留下“此地古称佛国,满街皆是圣人”的对联,下联即是对泉州文教昌明、人才辈出的由衷赞誉。宋代状元出身的泉州知州王十朋更是撰联盛赞:“八闽形胜无双地,四海人文第一邦”。明代泉州府学教授梁惟恕在《泉州府学记》中写道:“温陵名邦,理学渊源,甲于闽南。”这些评价,让“海滨邹鲁”有了更客观的注脚。

千年弦歌不辍,书声依旧。那些藏在泉州书院里的智慧、文脉里的传承,折射出重教兴学的初心使命,仍在续写着泉州“海滨邹鲁”的传奇。



石井书院内的朱松讲学图(王柏峰 摄)



泉州古城小山丛竹书院遗址,成为古城居民的阅读空间。(王柏峰 摄)



欧阳书院(来源:泉州史志)



始建于元代的龙山书院(来源:惠安文旅)